

江灿腾 60 还历自选纪念集

新视野下的

台湾近现代佛教史

江灿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灿腾 60 还历自选纪念集

新视野下的 台湾近现代佛教史

江灿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视野下的台湾近现代佛教史/江灿腾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004-5738-3

I . 新… II . 江… III . ①佛教史—台湾省—近代②佛教史—台湾省—现代 IV .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48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封面设计 三未舫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8

字 数 45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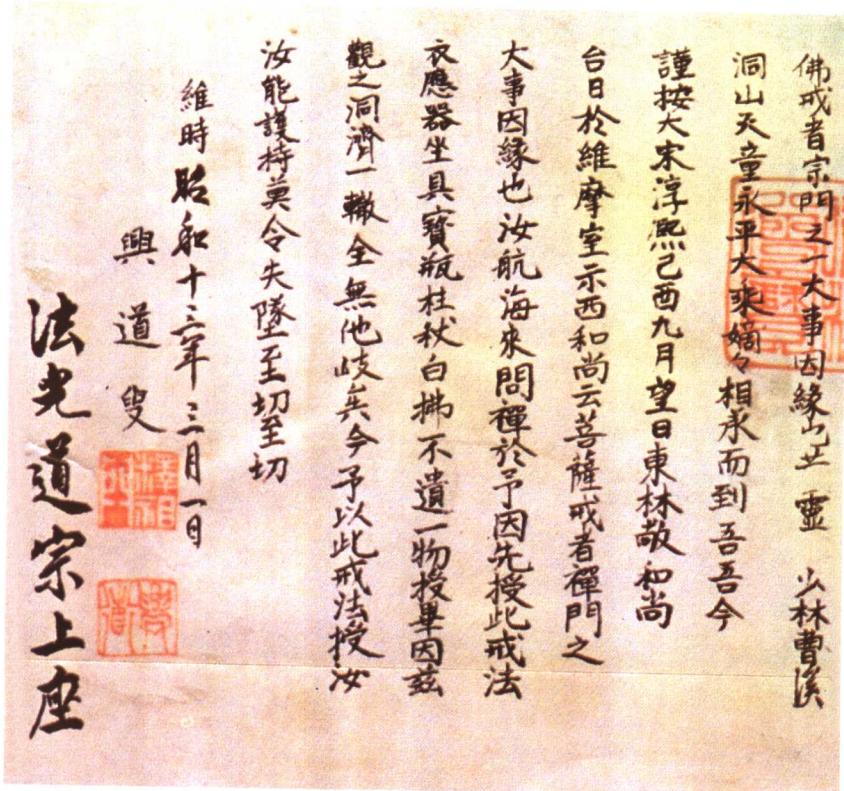
攝殿經藏於人上恩聖偕戒得山鼓和清年四國民



清代以来台湾僧侶受戒都远赴福建鼓山涌泉寺，迄 1915 年的日本统治时期仍沿习不变
(照片为僧人受戒后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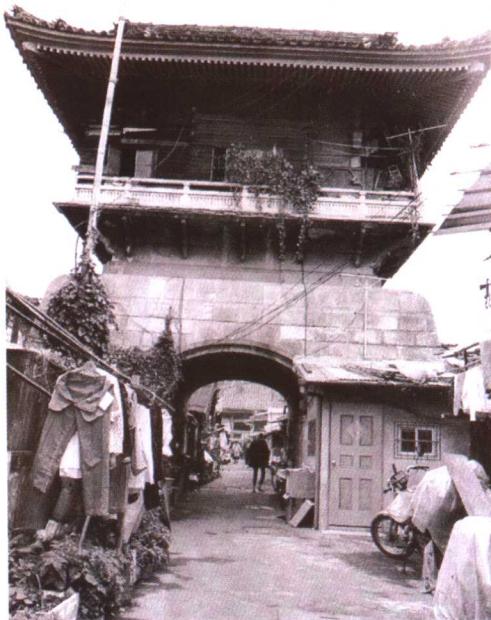
1925 年台湾海峡两岸的佛教精英共同参与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东亚佛教大会”
(照片为出席大会代表合影)



日本在台湾统治后期，已有台湾尼僧赴日本就学并接受禅门曹洞宗的传法与受戒（左上为如学尼僧像，右上为观音帽、如意，右中为法器，下为日本曹洞宗颁发的戒牒）



日本在台湾统治后期，台湾佛教精英赴日本就读大学，必须参加校内狂热的军国主义之洗礼（照片为战争动员集会场景）



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后，其遗留的美丽寺院中的钟楼被1949年来台湾的难民据为住宅和充当晒衣场，景象破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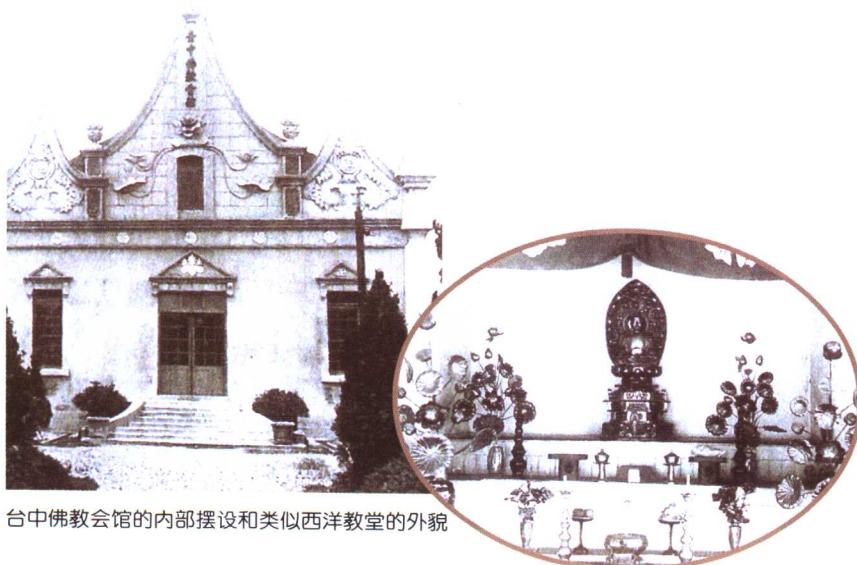
1949年由青岛湛山寺倓虚大师
(上)门下慧峰法师(左)来台“重
建大陆佛教”于台南市



青岛湛山寺全景



有台湾佛教“马丁·路德”之称的林德林法师和他所创立的台中佛教会馆



台中佛教会馆的内部摆设和类似西洋教堂的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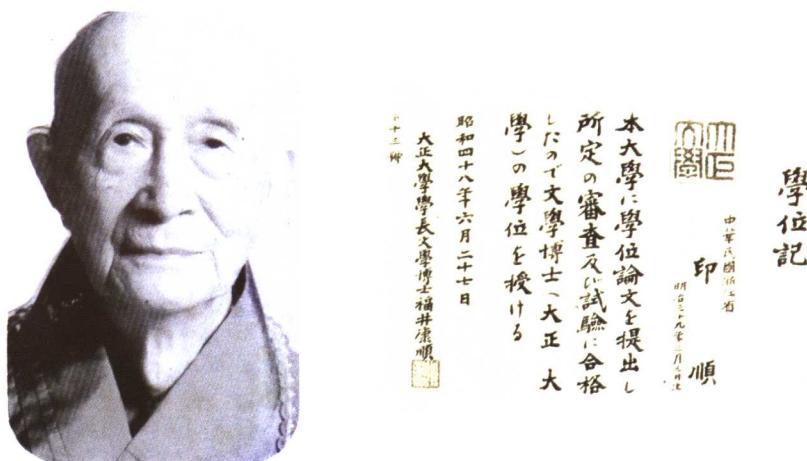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四大法派之一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的开山祖师善慧法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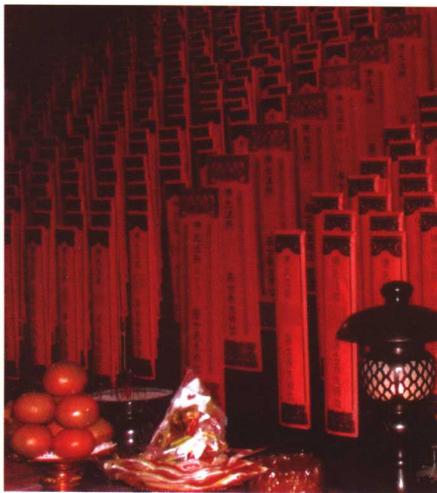
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的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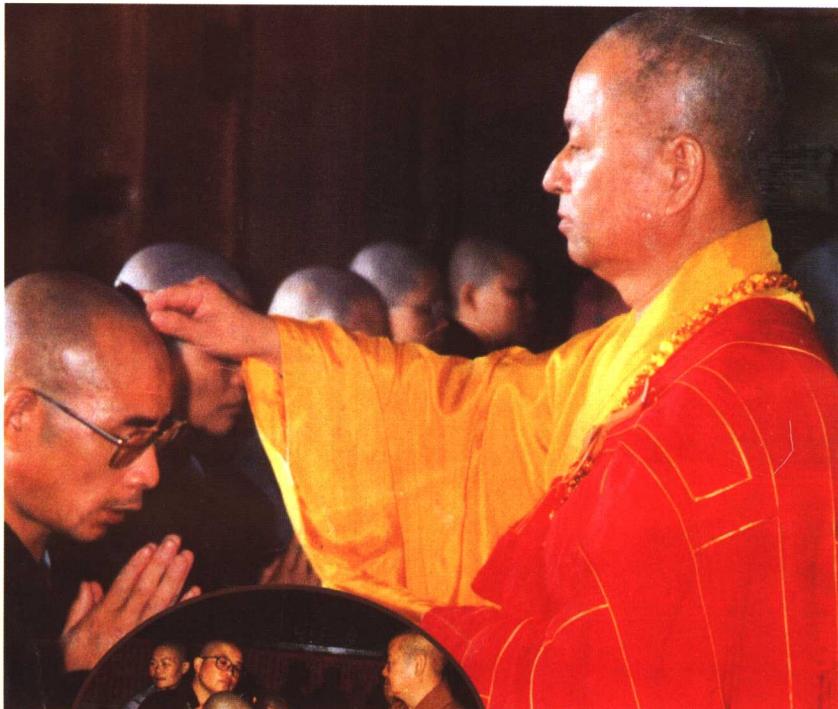
战后胡适博士来台湾引起唐代禅宗史研究的论战（右为胡适69岁照片，左为与论战相关的著作书影）



印顺导师因撰写《中国禅宗史》获颁文学博士学位（左为印顺，右为学位证书）



战后台湾佛教每年农历七月的盂兰盆法会和祭祖习俗，仍沿习大陆传统佛教的仪轨不变（照片为法会场景）



火烧菩萨头：

战后台湾僧侶的传戒仪式和在头顶上点香疤的作风，皆沿习自大陆传统佛教的惯例



战后台湾都市知识分子的佛教徒遽增，遇有举办佛书读书会，来参加者非常踊跃（上为作者与读者交流，下为作者在讲课）



1995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佛教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上为印顺〔左〕与赵朴初〔右〕的初次会面，下为两岸佛教学者在北京大学校园召开的“佛教现代化”会议的代表合影，后排右四为本书作者）



1995年夏，作者首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之邀来北京作学术交流，由韩秉方先生(左)陪同游北京大学校园



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中）与作者（右）

序

葛兆光

几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时候，江灿腾博士从台湾写信来，命我为他的博士论文写序，我苦辞不获，便在书前写了一篇《小引》，说到读后的一些感想。这篇感想中涉及佛教史研究的方法，我说：“具有近代意义的宗教史研究，经历了近百年，仍未见有‘范式’转换的迹象，所以现在有些步入困境的感觉。台湾的事情不十分熟悉，所以不敢说，而在大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有些莫名焦虑，当然，除了那些仍然觉得守住一亩三分地就心满意足的人之外。因为，过去那种怀有某些政治意图的宗教史方法仍然在引导着一些人的思路，教科书的格局还在约束着不少人的写法，使他们下笔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走上了旧路。毕竟那些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立场和视角、教科书式的章节和语言实在太熟悉了，在熟悉的语境中似乎有安全感和认同感。”江博士的那本大著出版已经几年了，几年间，好像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学术的变化竟然如此之慢，不由让人在焦虑之上再添焦虑。所以，这里借了给江博士新书写序的机会，把已经说过的旧话再说一遍。

和所有其他历史学领域一样，当研究者进入佛教史领域的某一课题时，必然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观察立场和切入角度。大约十来年前，我曾经说，大陆现在的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毋庸讳言，两岸的佛教史研究领域，至今仍然充斥着一些“没有问题（意识）”的论文，一些人依着惯性写论文发表论文，却并不自觉意识到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也不知道这个题目做了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很多著作写成“概论”，而很多论文似乎都在“复述”，这让人很悲哀。这一点，江灿腾博士曾多次用很尖锐的口吻批评过，也曾经让一些人不快，但却是实话实说。也许，这是过于高调的苛求，是过于严厉的标准，不过，在这个资讯借了电子技

术满世界飞的时代，你没有办法蚂蚁缘槐夸大国，关起门来充大王。尤其是佛教研究，这个从十九世纪以后就有国际性的学科，和研究中国其他历史的学科还不太一样，你无法不面对人数颇多、背景不一，而且相当严厉的国际级裁判的挑剔目光。

除了问题意识以外，我总觉得，任何一个历史学者，哪怕是刚刚入行的年轻学者，在任何一个课题上，都要考虑三个面向。第一个是文献资料。尽可能地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最起码的上手功夫，很多佛教史的研究论著，给我的印象是，在文献上仿佛是旧货翻新或者“资产重组”，凭了一点灵感把前人用熟了的那些资料再加热重烩。其实，在佛教史的领域，没有被发掘的史料还相当多，很多人却视而不见，在宝山周围转了一圈又空手而归。我很赞赏江灿腾博士的佛教史研究，就是因为无论在明清佛教，还是在台湾佛教上，他都尽可能地发现新文献，使用新资料。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发现历史”，可是，你不去发掘史料，历史怎么可能让你从容发现？第二个是学术史历程。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不是第一个探险者，以前的学者走过的路有多长，他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哪里是他们止步处？这需要一一回顾，才能确定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否则，要么是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还自诩是开拓道路，要么是照了前人走错的路再走一遍还以为自己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因此，当你注意学术史的时候，你无法不面对胡适、汤用彤、陈垣、陈寅恪，也无法不面对欧阳竟无、太虚、吕澂。对于今人来说，如果不思变革，前人的存在或许便是偷懒的依凭，如果有心超越，那么他们的存在可能也是巨大的障碍，但无论如何，他们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垫脚石”。江灿腾先生的研究，常常很注意这种学术史。他并不专门研究禅宗史，但他关于禅宗史研究的回顾，就很仔细而且相当深入^[1]。我想，只有对学术史的稔熟，才能在佛教史领域，判断什么是前人未曾见识的生猛蛟龙，什么是别人已经弄得烂熟、了无生气的死蛇。第三个是国际研究界。自从马克斯·缪勒以来的一百年，宗教学和宗教史已经有很多积累，而近来又有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欧美和日本的一些关于佛教史的研究，也时时向我们挑战。日本学者对佛教文献的深入发掘，美国学者对佛教史采取的批判性解读，欧洲学者对佛教实存状况的人类学调查，你如果不时时关注他们的进境，你的研究一旦

[1] 尽管我并不完全赞成他关于忽滑谷快天与胡适的一些评论，也觉得他没有注意沈曾植《海日楼劄丛》关于楞伽宗、法如碑和神会资料的论述，是一个缺憾。